

中华历史名人

邹容

● 王学庄

新蕾出版社

中 华 历 史 名 人

邹容

新 蕾 出 版 社



[津]新登字(90).004号

责任编辑 李征夫

《中华历史名人》丛书

邹 容

王学庄

*

新 蕾 出 版 社 出 版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960毫米 1/32 印张4 插页3 字数59,000

1993年5月第1版 1993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3,000

ISBN 7-5307-1237-3/K·112

定 价: 2.90元

英雄



编者的话

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，以其勤劳、勇敢闻名于世，他们所创造的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，源远流长，博大精深，堪称人类精神文明宝库中的瑰宝。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，造就了一大批在世界上也是赫赫有名的杰出人物，他们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外交、科技、文化艺术等领域内，为推动中国历史的前进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他们是中华民族的骄傲，也是永远值得我们每个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。

在祖国蒸蒸日上的当今盛世，为了弘扬民族的优秀文化，继承民族的光荣传统，激发年轻一代的爱国热忱，增强其自强不息之民族精神，我们组织编辑了这套《中华历史名人》丛书。这套丛书共收录中国历史上著名人物 100 名，以时间为序，每个人物单独成册，每册五六万字，以传记的形式介

$$f_{\text{eff}} = \frac{1}{\pi} \left(\frac{1}{\sqrt{1 - \frac{1}{2} \frac{v_{\text{eff}}^2}{c^2}}} - 1 \right) \approx \frac{1}{\pi} \left(1 + \frac{1}{4} \frac{v_{\text{eff}}^2}{c^2} - 1 \right) = \frac{1}{4\pi} \frac{v_{\text{eff}}^2}{c^2}$$

2

这套传记丛书，共 100 册。在较短的时间内，一次同时推出，是出于我们的一种紧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。它们将以宏伟的规模、完整的队列，引起读者的注意，满足社会的需要。但由于时间仓促，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，希望读者和专家、学者批评指正。

1992 年 10 月

王学庄

弘扬民族优秀传统 铸造华夏辉煌未来

特约审稿人：

尚明轩 刘泽华

黄宜民 罗宗强

冯尔康 裴效维

罗宏曾 王 真

顾问 萧 克

主编 顾传菁 李福田

策划 门腾棣 宋子衡

编委会(以姓氏笔划为序)

文秉勋 李知光

李树人 李福田

吴恩扬 张殿英

国荣洲 郑秀桂

顾传菁 耿志远

殷瑞渊 郭占魁



目 录

巴山少年	3
不肖之子·醉心新学·到日本去	
东渡扶桑	22
上海待航·东京著书·快剪除辫	
沪江风云	42
拒法拒俄·风雨同舟·中国学生同盟会	
《革命军》	65
脱奴隶进国民·中华共和国·革命最强音	
黑狱英魂	87
激流勇进·苏报案·西狱·埋骨华泾	
至今人念大将军	119



少年壮志扫胡尘，叱咤风云《革命军》。
号角一声惊睡梦，英雄四起挽沉沦。
剪刀除辫人称快，铁槛捐躯世不平。
风雨巴山遗恨远，至今人念大将军。

这首诗是吴玉章为纪念辛亥革命时期杰出的革命宣传家邹容而作的，它概括了邹容一生的功绩，表达了人们对这位慷慨献身的青年英雄的无限哀思。

邹容，字蔚丹，四川巴县（今重庆）人。1885年生于商人家庭。5岁入塾读书，后曾从外国人学习英语、日语，并肄业于经学书院。他饱读诗书，却不愿参加科举考试。1901年，决心出国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，入选四川留日官费生，临行却被除名，于是愤而自费前往。先赴上海入广方言馆，1902年

秋抵日，入东京同文书院。在日本，他贪婪地阅读中外政治书刊，积极参加留学生的政治活动，迅速站到革命派一边。为激发民众的革命意识，他开始撰写《革命军》一书。1903年3月，他与张继、陈独秀等愤于清朝官吏姚煜的横暴和丑行，剪去姚的辫子。为此于4月初避回上海，并积极参加了拒法、拒俄运动。他制定章程，发起中国学生同盟会，努力促使爱国运动向革命运动转变。他还同章太炎、章士钊、柳亚子等结为好友，共同致力于革命宣传。6月，《革命军》一书出版。他在序言中自署为“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”。这本书高举民族民权主义的旗帜，号召人民起来革命，推翻腐朽卖国的清朝政府，建立自由平等的“中华共和国”。《革命军》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，以后还被翻印成多种版本广为流传，成为辛亥革命中影响最大的革命宣传品。为了扑灭刚刚兴起的革命运动，清政府制造了轰动中外的“苏报案”，查禁《革命军》，查封《苏报》，逮捕章太炎等。邹容决心赴汤蹈火以唤起民众，投案自首，被判处二年监禁，罚做苦工。他不堪狱方虐待，身患重病，于1905年4月3日逝世，年仅20岁。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，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追赠他为大将军。

巴山少年

不肖之子

四川重庆，屹立在嘉陵江和长江的汇合处，岭云峡雾经常光顾这苍郁葱笼的山城。由中原大地前往西南边省，越三峡而上，将要遇到的第一雄关便是重庆。从遥远的巴子国算起，在漫长的历史上，它既是兵家必争之地，又是百货辐辏之区，北辙南辕，西驾东舫(yī)，牵动万里。1891年，这里被辟为面向列强的商埠，渝州士民对祖国命运的忧虑，从此愈加沉重了。

1898年，一个名叫成田安辉的日本浪人，受外务省差遣，往我国西藏探听虚实，经过重庆时路费将尽，便在日本领事馆里替当地商人的子弟补习英语。在回国后的报告里，成田没有忘记这手得意之作，但他万万没有想到，他的学生里会出现后

日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龙腾虎跃的人物，而超群卓伦的，竟是其中最不起眼的孩子，年仅 13 岁的邹容。

邹容，当时学名叫绍陶(yáo)，又名桂文，字蔚丹，有时也写成威丹、味丹、慰丹。1885 年(清光绪十一年)生于巴县城内(今重庆市)夫子池洪家院子一个商人家庭中。父亲邹如珣(yú)，字子璠，是县庙街上利川升苏货号的店东。邹容出生时，家中有祖父世兴、母亲邹氏、异母兄绍阳等几口人。不久，全家迁入左近的小较场邹氏家祠，人口也慢慢地增加了。母亲生下了弟弟绍隆、绍曾、绍培、绍陵和两个妹妹。母亲去世后，父亲又娶了继母杨氏，生下两个妹妹和弟弟绍陞、绍陈。哥哥娶了嫂子邓氏，还添了侄儿邹枚、邹植。邹容的少年儿童时代，就是在这样一个入多口杂的大家庭中度过的。

邹如珣早年弃学从商，由学徒起家，终于自己开起店号来。他经常把四川的土产运往宜昌、汉口、上海等码头，然后再把下江的土产带回重庆，有时还远走西安、广州。靠着机遇和精明的盘算，中年以后便成了一个殷实的商人，除了利川升之外，还同别人合伙开了一家同溢园商号。可是在封建专制制度之下，商人虽富，社会地位并不高，不仅被排居士、农、工、商四民之末，还经常要受到官

府的盘剥。邹容后来曾感慨地说：“外国之富商大贾，皆为议员，执政权，而中国则贬之曰末务，卑之曰市井，贱之曰市侩，不得与士大夫为伍。乃一旦偿兵费，赔教案，甚至供玩好、养国蠹者，皆莫不取之于商人。若者有捐，若者有税，若者加以洋关而又抽以厘金，若者抽以厘金而又加以洋关；震之以报效国家之名，诱之以虚衔封典之荣，公其词则曰派，美其名则曰劝，实则敲吾同胞之肤，吸吾同胞之髓，以供其养家奴之费，修颐和园之用而已。”这种感慨，是清末商人境遇的一种写照。邹如珩经商多年，受够了贪官污吏们的气，很想摆脱低人一头的境地。当时，许多商人借着政府卖官鬻（yù）爵之风，捐得个品阶不等的官衔，翎顶辉煌，办事情，做生意，马上就方便了。邹如珩却不肯花费这种让人瞧不起的钱。他在社会上是个耿直、倔强的商人，在家庭里是个威重严厉的父亲。他希望儿子们都能发愤读书，循着科举道路青云直上，博得一官半职、三代荫封，好更换门楣，耀祖光宗。

认真地说，中国行之千年的科举制度，到清代已精密、完善至极，同时流弊、祸害也至极。有识之士，无不认为它已经过时，不但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，甚至也无益于封建统治，应该加以改革，提倡经世致用之学。邹容后来指责清政府对待读书人，

“困之以八股、试帖、楷折，俾之穷年矻(kū)矻，不暇为经世之学”；“辱之以童试、乡试、会试、殿试，俾之行同乞丐，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”；“汨之以科名利禄，俾之患得患失，不复有仗义敢死之风”；“縶之以庠序卧碑，俾之柔静愚鲁，不敢有议政著书之举”，便是对科举制度的全面否定，同时也表明了他和父亲的分歧所在。但在邹容幼时，科举仍是读书人进身的主要阶梯，我们不能要求邹如珩也摆脱世俗之见。

比邹容大7岁的邹绍阳，便是遵从父命去奔锦绣前程的肖子，尽管运气并不太好。他早就入了县学，还补了廪生，用俗话说，大小是个秀才了，但始终没能考中举人。直到1909年，科举制已经停止，清政府为解决秀才们的出路，又举行一次优拔贡考试，这才获隽(jùn)拔贡，次年朝考，授补用知县，分发到陕西。因为儿子得了七品官，父亲也如愿以偿，循例得到散秩五品奉政大夫的封典，俨然是一方绅士了。遗憾的是好景不长，邹绍阳署理城固知县还不到半年，武昌便爆发了起义。

哥哥举途多乖(guāi)并非偶然，他天资不算高，入学后又骄傲自满，学业没有多大长进。弟弟却是一个聪明绝顶而又锲而不舍的人，5岁入塾馆启蒙，9岁就能作整篇的文章，到十一、二岁时，

《周易》、《诗经》等九经，以及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，都已经背得很熟。如果再用心琢磨琢磨时文制艺，也就是八股文章，要像哥哥那样博取一领青衿，显然易如反掌。父亲见儿子才华横溢，暗自把他看作将来点翰林的材料，11岁就让他跟着哥哥进了考场。借着老大考上秀才的高兴劲，父亲勉励老二也早步哥哥后尘，没想到邹容却冒出一套不中听的话：“臭八股，儿不愿学！科举试场，儿不愿进！衰世科名，得之又有何用？”屡次顶撞的结果，邹如珣脾气大发，命令不肖子趴在床上，狠狠鞭笞(chī)，打得皮开肉绽。又有一次，命令儿子跪在用砖垫起的竹竿上读制艺范本。跪了两天，邹容居然交上了一篇八股，父亲无从判断优劣，便去请教同院住的一位当过两广总督幕僚的老先生。也许邹容作的八股还过得去，但这位老先生更是深于世故，知道父亲望子成龙心切，便装模作样地连声叫绝，夸奖邹容是个神童，说得邹如珣乐呵呵的，这才替邹容解了围。可是邹容仍旧不肯去应试，父亲拿他也实在没有办法。

邹容哪来这么犟的脾气呢？他不仅很犟，连带着还有许多怪癖，亲戚、朋友说他“少不羁，易谩骂人”，“好大言，傲视一切”，“性倜傥，好骂人”，“年少剽急”。总而言之，脾气不好，夸诞，孤傲，偏激，

暴躁，不易接近。好心的人总想规劝他，遇着他佩服的，还给点面子，“虽面从意弗善也”；若是他讨厌的人，无异是在讨骂了。他也多少知道自己的毛病，所以改名为“容”以自警，但效果并不大。这样一来，尽管大家知道他“虽好为大言，时亦有中肯语”，却不敢轻易接近他。邹容养成这样一种脾气，原因很多。他生于富商之家，从小娇惯放纵，后来母亲一死，“后母待之颇严”，父亲虽然“爱海独周”，但思想境界不同，脾气尤其之坏，他经常要忍受无端的委屈。而社会的黑暗腐败，民生的艰难困危，家庭的横遭歧视，都刺激着这个早慧的心灵。他愤世嫉俗，但不知出路何在，更不为他人所理解。种种矛盾，种种冲突，半盲目半自觉的反抗，终于使他的性格发生了扭曲。此外，他在考虑立身行事时，一方面崇仰“经世之学”、“著书议政”，另一方面又追求传奇色彩的“仗义敢死之风”、“乡曲豪举”、“游侠之雄”，这种追求显然使他放松了对自身行为必要的约束。邹容的怪脾气曾经帮过他的忙，抵制了父亲逼迫他走科举道路的企图，但在社会上却给他带来不少困难，他“性喜交游”，大家却都怕他，弄得落落寡合，朋友无多。随着年龄的增长、思想的成熟和环境的改变，邹容的脾气也有所变化，盲目性大减，但带来的困难仍然不少。

醉心新学

近代中国的“新学”，也就是西方的科学知识、社会学说和中国思想界的革新主张，影响到西南门户重庆，显然比沿海地区要晚得多。这里很不容易买到新学书刊，梁启超编的上海《时务报》在重庆一带最初只发行 20 份，到 1898 年虽增至 60 份，却经常脱期。本地的第一家报刊《渝报》，出现于 1897 年冬。《渝报》创办人宋育仁（芸子）是康有为维新变法主张的拥护者，在北京参加过强学会。1896 年，他以翰林院检讨身份来渝充任商务局监督，在综理通商、工矿的同时，与教育界的江瀚（叔海）等着手创办刊物，自任总理，以杨道南任协理，潘清荫、梅际郇任正副主笔。《渝报》刊出了宋育仁的《时务论》、《守御论》等文。这些在全国来说已不算新鲜的维新议论，在死水般的古城中却激起了阵阵波澜，一时为青年士子们所争诵。1898 年，宋育仁去成都，接受友人建议，将《渝报》迁蓉，变成面向全川的《蜀学报》，江、杨、梅等也先后离去，重庆新学界顿时冷清起来。潘清荫只好就《渝报》的设备改出白话报《渝州新闻》，仅仅登载本埠及国内外消息。《渝报》失去思想指导者后发生的蜕化